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doc51ver.com  
商家本本店

# 资本主义与自由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美] 奥利弗·E. 威廉姆森著

人类行为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

资本主义与自由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

[俄] 尼·布哈林著

家庭论

[美]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著

福利经济学

[英] A.C. 庇古著

改造传统农业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著

自由的限度

[美] 詹姆斯·M. 布坎南著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 约翰·R. 康芒斯著

各国的经济增长

[美] 西蒙·库兹涅茨著



网 址: [www.ep.com.cn](http://www.ep.com.cn)

ISBN 7-100-04167-8



9 787100 041676 >

ISBN 7-100-04167-8/F·496

定价: 15.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资本主义与自由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

张瑞玉 译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与自由/[美]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004重印)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7-100-04167-8

I. 资... II. ①弗... ②张... III. 弗里德曼, M. -  
经济思想 IV. F0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2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资本主义与自由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

张瑞玉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167-8/F·496

---

1986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年7月第2版

印张 7 3/4

2006年5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5.00 元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62, 1982, 200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本经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0 年已先后分九辑印行名著 36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 2004 年底出版至 4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 年 10 月

## 中译本序言

本书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 )是美国人,为该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且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被认为是西方最保守的经济学者之一,曾任美国共和党的人物尼克松和戈德华特的私人经济顾问。弗里德曼的主要著作有:《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自由选择》等书以及许多篇文章和小册子。

弗里德曼的声誉主要来自他在三个方面的著作:第一,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由于在这一领域中的著作,他成为西方的“货币主义”的领袖并且被认为是目前的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驱者;第二,在消费函数上的永久性收入的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而本书是他阐述第三方面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极端右倾的与政治密切有关的经济思想流派。很可能由于它的极端右倾的特点,虽然受到西方保守政治家的推崇并且在目前扩大了它的影响,但是,正如弗里德曼在本书《1982年序言》中所承认的那样,它仍然未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且它在实际问题上的作用依然有限。

新自由主义大致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代表人物为



西德的欧根、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以及本书的作者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进行干预。但是，他们又认为，一方面应把干预限制在最少程度，另一方面，最好还要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进行和实现干预，以便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本书中，弗里德曼论述了大致相似的观点。他宣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把人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活动的最好的方式，是在没有强制手段下的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并且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缔结相互有利的契约。他写道：“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把这一说法作为根据，弗里德曼对西方国家近数十年来对经济生活的日益扩大的干预，特别是美国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日益扩大的干预不但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而且也缺乏效率，从而不会取得干预所期望得到的成果。因此，他主张，某些被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干预项目（如发给营业执照）应该取消，而某些被一般人认为是必要的干预项目（如邮政）应改由私人经营。换言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但要被限制在最低的水平，而且还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据说，这

样不但可以取得最有成效的结果,而且还可以保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从而也就可以保卫他所信奉的自由的原则。

由此可见,弗里德曼在本书中所做的,正和许多新自由主义者一样,不过是在“保卫自由”的名义下,重复过去流行于西方的“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的论调。然而在事实上,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是通过完全自愿的交换而组成的自由社会,特别是对广大的白领和蓝领劳动者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没有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往往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由于生存的需要而被迫缔结雇佣劳动的契约。对于西方所宣传的这种自由,马克思早已多次指出它的虚伪性质。例如,马克思曾以讽刺的语气写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sup>①</sup>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当然,本书的错误之处远不限于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国内外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全面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sup>①</sup>

尽管本书的主要观点具有很大的错误之处,但是,本书也具有某些值得参考的论点和资料。例如,为了论证减少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弗里德曼部分地否定凯恩斯主义并且全面地否定它所支持的财政政策。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一方面指出凯恩斯的著名的“乘数论”的无效之处,另一方面又说明,由于时间的拖延,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稳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反而会扩大它的波动程度。这些论点对于评价凯恩斯主义具有一定的意义。又例如,为了说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弗里德曼揭露了美国医学协会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惜牺牲人的健康而对美国的医疗事业进行有害的控制。这种资料有助于暴露自私自利的动机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有害后果。

高鸿业

2003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

<sup>①</sup> 这里举出两本。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哈沃斯:《反对新自由主义》,纽约路特里季出版社,1994年。

## 2002 年版序言

在本书 1982 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 1962 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 1980 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次舆论气氛变动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和最初出现福利国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急剧扩大。在 1956 年,当我把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讲稿进行讲授时,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联邦的、各州的和地区的——占国民收入的 26%。这笔支出的极大部分是用于国防。非国防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 12%。25 年以后,当此书 1982 年版出版时,总支出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 39%,而非国防的支出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国民收入的 31%。

舆论气氛的变化产生了它的效果。它给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对于人为造成的而又自我扩大的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膨胀,他们虽然无法制止,但是却能加以限制。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的确稍稍下降,从 1982 年国民收入的 39% 降到 2000 年的 36%,但是几乎所有的缩减都来自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环绕着一个大致不变的水平波动:如 1982 年的 31%,2000 年的 30%。

在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和 1992(应为 1991 年。一译者)年苏

联瓦解时,舆论气氛得到同一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 70 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究竟应该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更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早已被一系列类似的试验预示出来:中国的香港、台湾对照中国大陆,西德对照东德,韩国对照朝鲜。但是,只有柏林墙的戏剧性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才使得上述的结果成为一般共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们现在认为中央集中计划的确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于 1944 年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卓越著作所争辩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从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爆发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爬行式或停滞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今的压力是趋向于给市场较大的作用,而给政府较小的作用。我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长期落后于舆论的事实。二战后数十年中的、迅猛的社会化反映了战前舆论趋向于集体主义的变动;而最近过去的几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滞的社会主义则反映了战后舆论变化的早期效果;未来的非社会主义化将会反映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以加强的舆论变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对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舆论变化甚至还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在最大的、剩下来的、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国,影响也是如此。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期,由邓小平引进的市场改革,事实上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并且把更多的市场成分引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这种有限的经济自由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中国

的面貌,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中国仍然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紧接着二战后的时期,标准的教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央集中计划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鲍尔和其他人如此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公式不论在何处使用,它都遭受了失败;而东亚四只小老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国家,甚至非洲少数几个国家都采用市场导向的途径而让政府起着较小的作用。许多前苏联的卫星国家也采用同一方针。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经济自由的增长与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已经携手并进,并导致了财富的增加,竞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主题相一致。

一个最后的个人方面的按语:对一本书的作者而言,在该书第一次出版 40 年以后能来评价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难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机会。现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这本书能够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对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巨大之点需要改动的话,那就是以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来替代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当我最初写完此书时,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使我

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以此而论,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大缺点似乎是对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着不恰当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2年3月11日

## 1982 年版序言

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这些讲稿是在 25 年以前讲授的。要想重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气氛,即使对生活在那时的人而言也是困难的,更不用说对那时还不到 10 岁或者还没有出生的一半以上的现有人口而言了。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胜利导致了政府权力的增长,而我们这些深切地关心这种增长对自由和繁荣所造成威胁的人则是一小群少数派,受到同一时代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围攻,被认为是思想古怪的人。

甚至在 7 年以后,当本书第一次出版时,它的观点是如此地远离主流思想,以致它并没有受到任何主要国家级刊物的评论——没有评论的刊物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那时仍然在纽约出版)、《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星期六评论》——尽管它也受到了《伦敦经济学家》和主要的专业杂志的评论。然而,在其后的 18 年中,这本面向一般群众,由美国一个主要大学的教授所撰写的书却销售了 40 万本以上。可以想像,由一个类似职业声誉的经济学家所撰写的而又倾向于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著作决不会受到类似的缄默抵制。

在过去 25 年里,知识分子思潮有多大的变化可以从我妻子和我于 1980 年出版并继承《资本主义与自由》基本哲理的《自由选择》所受到的大为不同的接受程度加以证实。对于《自由选择》各



个主要刊物却予以评论,而且经常是长篇特写。此书不但部分地转载于《书刊文摘》,而且还在封面上加以表明。《自由选择》在它出版第一年,就在美国销售了约40万本硬面本,被翻译成12种外国文字,并且在1981年早期发行了大批量的平装本。

我们相信这两本书所受到的不同的接受程度绝不能以品质的差异加以解释。确实,较早出版的那本书更加哲理化和抽象化,从而更加涉及基本原理。其后的《自由选择》,正像我们在该书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和较少的理论框架”。它补充而不是取代《资本主义与自由》。从表面上看来,接受程度的不同可以归结为电视广播的力量。《自由选择》是根据我们同一名称的PBS电视系列节目而撰写的,因此可以认为电视系列节目的成功使得该书受到巨大的关注。

上述的解释是表面化的,因为电视节目的成为事实以及成功的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思潮变化的证据。在1960年代,从来没有人向我们联系过像《自由选择》那样的电视系列节目。那时,这种节目很少会有赞助人。如果这种节目碰巧被制作出来,那么也不会有大量的观众接受节目的观点。与表面化的解释不同,对后一本书不同的接受程度和电视系列片的成功正是舆论气氛变化的共同后果。目前,我们这两本书的观点仍然远离知识分子思潮的主流,但是他们至少在知识分子群体内受到尊重,并且很可能接近于广大群众的共识。

这种舆论气氛的改变的原因并不来自本书或者来自许多其他的著作,例如,具有相同哲理传统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引用《评论》的编者在

1978 年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研讨会所散发的征稿启事。征稿启事的部分内容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观点近来对一些知识分子而言，开始成为似乎可信的说法，而这些知识分子在过去不但一度把这种观点看成是错误的，而且甚至看成是政治上危险的。”我提供的稿件包含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一段引文、亚当·斯密著作的一段较短的引文以及稿件结束时的邀请语：“欢迎参加。”<sup>①</sup>即使在 1978 年，在除我以外的 25 位提供稿件的人中，只有 9 位表示了能够被认为是同情《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基本思想的观点。

舆论气氛的变化是由事实经验，而不是由理论或哲学所造成的。一度是知识分子阶层希望所在的苏联等国家显然已经失败。英国，它的费边主义对美国知识分子曾经起着决定性作用，已经深深地陷入困境。以接近美国的情况而言，总是坚信大政府的知识分子和美国民主党的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已经对越南战争感到困惑，尤其是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所起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大规模的改革措施——那些在过去有代表性的项目，如福利措施、公共住房、对工会的支持、学校的统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补助等行动——正在变为空中楼阁。这些人正和美国其他人一样，他们的钱包正由于通货膨胀和高额税收而受到冲击。这些事实，而不是那些论述原理著作的说服能力，才能解释从 1964 年巴里·戈德华特的压倒一切的失败，到 1980 年罗纳德·里根压倒一切的胜利的转变——这两个人在实质上具有相同的纲领和相同的观点。

---

<sup>①</sup> 《评论》，1978 年 4 月号，第 29—71 页。

既然如此,类似本书的著作的作用究竟何在呢?以我的看法,有两个。第一,为茶余饭后的闲谈提供一个主题。就像我们在《自由选择》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惟一真正能说服您的是您自己。您必须在空闲时把问题在您脑中反复思考,考虑许多争论之点,让它们持续酝酿;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您的偏好就会成为确信无疑的信念。”

第二,而且,更为基本的是,使得各种解决问题的道路继续存在,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加以选择。在私人的,特别是在政府的事务处理中,存在着巨大的惰性——即:受到维持现状的力量的统治。只有一次危机——不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被感觉到的——才能造成真正的变化。当那种危机出现时,所采取的行动就取决于当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这些,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基本作用,即:对现有的政策提出另一些可供选择的替代办法,使得这些办法不致湮没无闻并且能为人们所使用,一直到原来是在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成为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事情。

或许我本人的一次经历会证明我的上述论点。在1960年代的后期的某一个时候,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和一个坚持过时观点的集体主义者利昂·凯瑟林进行辩论。他那时认为,他对我的决定性的一击就是把我的观点作为极端反动的事物来加以取笑,而且他所选择这样做的方法是:朗读本书第二章的收尾部分包含的一系列政策的清单。我写道:这些政策“按照我的理解,根据以上所论述的原则,是不能够被证实为是合理的”。当他朗诵我对价格支持、关税等政策的严厉批评时,他从学生听众中得到了他想要取得的效果,一直到他朗诵到清单中的第11点“和平时期征兵制度”

时,这一效果才告终止。我反对征兵的意见引起热烈的掌声,从而使他失掉了那些听众和那次辩论。

顺便指出,征兵是我在清单中所列出的 14 项不合理的政府活动中惟一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取消的项目——而且这一胜利绝不是最终的。在许多其他项目方面,我们现在比过去和本书所主张的原则偏离的程度还要大一些——这一偏离一方面是舆论气氛变化的原因,而在另一方面,又可以证明:这种变化到目前为止的实际影响是很小的。这也可以证明:即使本书的某些例证和具体论述可能已经过时,但是本书的主旨对 1981 年和 1962 年的情况同样适用。

# 目 录

2002 年版序言 .....	1
1982 年版序言 .....	5
序言.....	1
绪论.....	4
第 一 章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	11
第 二 章 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	27
第 三 章 货币的控制 .....	43
第 四 章 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 .....	62
第 五 章 财政政策 .....	82
第 六 章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	93
第 七 章 资本主义和歧视.....	118
第 八 章 垄断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	130
第 九 章 职业执照.....	148
第 十 章 收入的分配.....	173
第十一章 社会的福利措施.....	191
第十二章 贫穷的减轻.....	206
第十三章 结论.....	213

# 序 言

在 1956 年 6 月,我在约翰·范·西克尔和本杰明·罗格主持并由福尔克尔基金会发起的在瓦巴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系列演讲。本书就是这些讲稿经过长期拖延后的产物。在其后的各年里,我在不同的福尔克尔会议上作了同样的演讲,包括阿瑟·肯普在克拉蒙特学院、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理查德·莱夫特威奇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主持的会议。每次演讲的内容包括本书阐述原理的第一和第二两章,然后把原理应用到不同类型的特殊问题上去。

我感谢这些会议的主持人,原因不仅在于他们邀请我作了演讲,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演讲的评论和把演讲以暂时性的方式写下来的友好压力。同时,我感谢负责安排这些会议的福尔克尔基金会的理查德·考纽理、肯尼思·坦普尔顿和伊凡·比尔利。我还感谢参加这些会议的人,由于他们对这些问题深刻的探索和浓厚的兴趣以及难于满足的求知欲迫使我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并改正了很多错误。这一系列的会议成为我一生中最有启发性的求知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用说,很可能是没有一个会议主持人或参加者同意这本书的一切。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不愿意承担为了促成这本书而作出的某些贡献。

我把这本书里的哲学观点以及其很多的细节归功于很多老

师、同事和朋友们,最主要的是归功于我能荣幸地与之交往的芝加哥大学的杰出的一群人物:弗兰克·H. 奈特、亨利·C. 西蒙斯、劳埃德·W. 明茨、艾伦·德赖克特,弗里德里克·A. 哈耶克和乔治·J. 施蒂格勒。我请求他们原谅,他们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论述中的很多没有被我具体地指出是他们的观点。我曾向他们学习的如此之多,而我所学到的东西又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成为我自己思想中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出应该指出的属于他们的观点。

我不敢试图列出我要感谢的许多其他人的名单,免得在无意中疏忽了应该列出的名字,从而造成对他们的不公正。但是,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孩子,珍妮特和戴维。他们不愿意接受不加论证的事物的态度,迫使我以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技术性的事物;从而,一方面改善了我对各个论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我有可能会改善我的表达方法。我必须指出,他们也只能承担本书的任务,而不是本书的观点。

我在本书中随意地使用我过去出版的著作中的材料。第一章是费利克斯·莫利编的《个人主义论文集》(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中的同名文章的改写本,也是以不同形式发表于《新个人主义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61年4月)的同名文章的改写本。第六章是首先发表于罗伯特·A. 索洛编的《经济学和公众利益》(洛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年)的一篇同名文章的改写本。其他章节的零星部分系取自我写的其他文章和书籍。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这本书肯定是写不成的”这种说法已成为学术著作序言中的常见的话。对这本书而言,这句话完全是合

---

乎事实的。她把不同讲稿中的片断综合在一起,根据不同的版本,把讲稿改变成比较接近于书面英语,她始终是推动本书完成的动力。在内封页上所作的说明低于她的真正的作用。

我的秘书穆里尔·A. 波特工作很有效率,在需要时又是一个可靠的力量;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本书的底稿以及前几稿的一部分的字是她打的。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绪 论

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关于这句话的论争集中于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内容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是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他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人，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

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伴随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政府不至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呢?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而历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即使使用这权力的人们开始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他们没有被他们使用的权力所腐蚀,权力将吸引同时又形成不同类型的人。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呢?在我们宪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给予了迄今能保护我们自由的答案,虽然这些原则被宣称为根本的方针而在实际上它们屡次受到破坏。

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然而,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满着危险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政府。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具备由此而造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通过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主要地依靠自愿合作和私人企业,我们能够保证私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限制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

在县的范围内行使比在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的范围内要好。假使我不喜欢我当地城镇所做的事情，哪怕是污水处理，或区域划分，或学校设施，那么，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城镇。虽然很少人会实际采取这一步骤，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能起着限制权力的作用。假使我不喜欢我居住的那个州所做的事情，那么，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州。假使我不喜欢华盛顿实施的事项，那么，在这个各国严格执行自主权的世界里，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当然，成立联邦政府的不利之处对许多主张成立的人来说恰恰是权力集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相信这会使他们更有效地——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以公众的利益来进行立法，不管它是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还是从私人的用途转到政府的用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正确的。但这个事物有正反两面，做有益的事的权力也是做有害的事的权力。今天控制权力的那些人不可能明天也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有害的。正像进行鼓动来扩大政府范围的悲剧一样，鼓动权力集中的最大悲剧是它主要是由那些首先会对其后果懊悔的有善良意愿的人所领导。

保存自由是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的保护性原因。但还有一个建设性的原因。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哥伦布并不是由于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虽然他的部分资金来自具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

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这些在人类知识和理解方面,在文学方面,在技术可能性方面,或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开拓新领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

政府永远做不到像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通过对房屋或营养或衣着的统一的标准,政府无疑地可以提高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而通过对学校教育、公路建筑或卫生设备设置统一的标准,中央政府能无疑地改进很多地区,甚至平均说来所有地区的工作水平。但是在上述过程中,政府会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多样性。

这本书讨论了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它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要的论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

头两章按照原则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应用在抽象的水平上论述这些问题。后面几章则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各种特殊的问题。

一个抽象的论述可以被设想为是完整和彻底的,虽然这种设想在头两章中肯定是远未实现。这些原则的应用甚至在设想中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每天都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作用的具体形式永远不能在一次中加以彻底说明而无需再加以补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结合当前的问题再次

审查被我们尊崇为不变的原则的现实意义。其中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地是对这些原则的再次考验以及加深我们对原则的理解。

对这本书所阐述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加上一个名称是非常有用的。正确和适当的名称是自由主义。不幸地，“作为一种最高的但未必是故意的颂扬，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曾认为占用这一制度的名称是有利的”<sup>①</sup>，因此，在美国，自由主义逐渐有着和它在十九世纪以及和在今天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很不相同的意义。

当它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被发展出来的时候，以自由主义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美国在 1930 年以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逐渐和它相联系的是：主要依赖于国家，而不是依赖于私人自愿安排来达到目标被认为是较好的办法。它的主旨成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

---

<sup>①</sup>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394页。

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把时钟拨回到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行动中,上述自由主义者喜欢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谴责为反动派。

附着在自由主义术语上的意义的变化在经济事务中比在政治事务中更为显著。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像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一样,赞成议会体制、代议政体、公民权利等等。然而,甚至在政治事务中,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差异。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由于酷爱自由,惧怕不管在政府或私人手中的集权,所以他赞成政治上的分权。由于致力于行动并且相信只要在表面上由选民控制的政府手中权力的仁慈的作用,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赞成中央集权的政府。关于权力应该放在州一级还是城市一级,放在联邦一级还是州一级,放在世界范围的组织还是国家政府中,他会提供任何解除疑虑的答案。

由于自由主义这一名词的滥用,以往属于那个名词的观点现在常常被称为保守主义。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一名词的语义来源方面以及在赞成社会制度较大改革的政治方面都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因此,他的现代继承者肯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保留干涉我们自由那么多的国家的干涉,虽然我们当然希望保留那些改进自由的东西。此外,保守主义这个术语实际上逐渐包括如此广泛的一系列的观点,包括相互之间的矛盾如此之多的观点,以至于我们无疑地将看到复合名称的增长,例如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贵族政治—保守主义。

部分地由于我不愿意向赞成毁灭自由的措施的人放弃这个名

词,部分地由于我不能找到更好的代替物,我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是  
以其原有的意义来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作为有关自由的人的  
学说。



# 第一章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当前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很多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强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采用苏联经济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够通过政治安排来保证个人自由。这一章的论点是: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意义上不可能是民主的。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经济自由的上述两种作用中,需要特别强调第一种作用,因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把这方面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们倾向于蔑视那些被他们看作为生活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并且倾向于把他们自己追求的被认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